



深度

胡耀邦逝世三十年

丁东：钟沛璋先生回忆胡耀邦与文革后的青年工作

十年浩劫之后，青年思想陷入极大的苦闷和迷茫当中，感到被愚弄，被出卖，陷入信任危机。广大青年存在着失学、失业、生活没有保障的困境。社会上对青年很不理解，认为青年是迷茫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责备比较多。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把这些账都算在青年身上。

2019-04-15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于1986年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摄：Jacques Langevin/Sygma via Getty Images

【编者按】：今天是胡耀邦逝世三十年的日子。本文原发于丁东先生个人微信公号“[丁东小群](#)”，端传媒获授权转载。

钟沛璋先生现年94岁，2009年他曾接受我们采访，回忆有关胡耀邦的一些往事。他说：

1953年，开始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我是上海《青年报》总编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社会主义就在你身边》，在《青年报》发表了，《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耀邦同志看到了，他觉得很有思想，指名把我调到北京。1954年初，我就当了《中国青年报》副总编，管文教方面的宣传。

耀邦自己直接抓团的报刊宣传，所以经常到报社来。我们团报团刊的负责同志，经常被叫到他家里开会，他及时传达中央的一些精神，布置题目，出思想，叫我们写文章，我在《中国青年报》写的好几篇文章都是耀邦定的题目。同时，我也跟耀邦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帮忙起草文件，比如在上海召开的全国青年工人会议，在延安召开的五省青年造林大会。1954年以后的几年里，跟耀邦接触比较多。1957年，党发动整风，号召大家鸣放，提意见。我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感到无政府状态的大鸣大放，应该加以引导，回来向耀邦反映。但是后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这是引蛇出洞，要反右。我就按照党的指示，连续写了几篇反右的社论。当时闹哄哄的，我说应该在讨论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大字报揭露很多问题，应该通过讨论，统一思想，形成团结。后来说，不行，要反右，我们按照耀邦等团中央领导的意思，也发表了几篇社论。

当时报社搞了好多右派出来，出名的有刘宾雁，他在《中国青年报》也是编委，青工部的主任，经常出去采访，写了《上海在沉思中》。还有一个副总编，叫陈模，从小就参加革命了，也给划成右派了。讨论我的时候，绝大部分人都不赞成，行政部门有两、三个人投票，要把我划右派，其他的干部都不赞成，所以给我一个党内警告处分，被下放到农村，带队劳动。

到了1958年，当时党中央主管工青妇工作的是刘澜涛，他要重新讨论工青妇的党的领导问题，就把1956年我们筹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的发言找出来。我当时的意见是青年工作应该有青年特点，应该有独立性，独立活动，青年对一些坏的现象应该有冲击作用。我说，“五四精神”就是反对坏的现象。当时认为这些发言都是右派言论。有相同

主张的项南、梁步庭都受了处分，从书记处的书记被贬到农村当公社当书记去了。给我戴上了右派帽子，还说是爱护我。这使我大为困惑。明明我是少年入党，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怎么忽然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我真不知道右派为何物。但既然反右是毛主席的决策，戴右派帽子是党组织的决定，思想不通，还得不断检讨认错。几年后，把帽子摘掉了，1960年回报社当普通编辑，我还是努力地干。

1964年，又要开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的几位团中央书记组织了一个班子，起草报告，写了几稿，感到不满意，就把我这个“摘帽右派”叫去参加起草。我写了一稿，几位团中央书记觉得还可以，就让我几个同志一起带着稿子到湘潭，请耀邦审阅。当时耀邦带职下放，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我到了他那里，耀邦没想到我也去了。说：“你也来了。”耀邦看了稿子，说：“不行，没有什么新思想。”他说，应该站得高，看得远，根据毛泽东思想，很好总结几年来共青团工作的基本经验，从当前国内外形势来分析共青团工作的地位、作用和任务，中心思想是要促进青年革命化。他亲自带我们住在招待所里，不断出主意，不断修改。常常是按照他原来的思想起草的稿子还没有写完，他的思想又发展了，于是又推倒重来，一个多月的时间前后写了七、八稿，终于写出一篇题目叫做《为我国青年革命化斗争》的报告。整个报告的调子是反修，是按照当时《九评》调子来写的。当时开团的省市书记会议讨论这稿子时候，大家一片叫好声，耀邦非常高兴。现在回头看，整个调子很左。

文革前报社成立了一个知识生活部，让我当副主任，我也写一些知识性的文章。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人就贴出大字报，把我和老伴陈敏，还有被打成右派的陈模，说成报社的“三家村”，我写的知识性文章成了罪状。

耀邦当时首先受到冲击，团中央是“三胡一王”。后来，耀邦跟我一起到了河南罗山的五七干校劳动，耀邦也做小工，扛大包，什么都干。当时我和老伴都是摘帽右派，没人理。有一次我和老伴拉着板车陷在泥里，旁边地里的人谁也不敢来帮着推一下，后来拉车的老伴突然感到轻松了，原来是耀邦过来帮我们把车子从泥里抬出来。还有一次，我的大儿子在东北生产建设兵团被无端打成反革命，关押的地方零下30度。老伴找到耀邦，耀邦立即给表兄杨勇写信，请求查清。杨勇当时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救了我儿子一命。

后来邓小平出来了，1975年让他和李昌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反击右倾翻案风又受到批判，要他和李昌写检讨。李昌很着急，这个检讨怎么写呢？他又把我找去，让我帮他写检讨。

我1968年去的干校。1975年回北京，没地方干工作了，《中国青年报》也没复刊。华国锋时代，我被借调到朝阳区党校讲课，还是捧着《毛选》五卷，当作经典，讲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理论。当时我的政治觉悟还是很慢的。后来又近代史所参加《民国史》编写，写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这一章。

胡耀邦再次恢复工作之后，以一种伟大的政治家气派，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组织真理标准讨论，进行一系列的工作。我学习了真理标准讨论，特别是参加务虚会，慢慢的认识水平才上来。务虚会我在中央的新闻单位那个组。务虚会谈得很不错，解放思想，谈了很多东西，确实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些问题。

接下来我就做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起草团的十大报告。1978年3月份要开团的十大。当时是团中央找我起草，韩英找我。耀邦当时有一个思想，是进行新的长征，让青年为中国的现代化而奋斗。我按照这个思想来起草报告。当时有人报告到中央，提出要像热爱毛主席一样热爱华主席，要像紧跟毛主席一样紧跟华主席。我说，我们不能再写这种个人崇拜的东西，把这个抵制掉了。起草完报告，我就回中国青年报社了。右派改正后安排我做《中国青年报》副总编，副社长，兼团中央研究室主任，那时候余世光是《中国青年报》总编辑。

第二件事，是推动全社会共同关心青年成长。十年浩劫之后，青年思想陷入极大的苦闷和迷茫当中，感到被愚弄，被出卖，陷入信任危机。广大青年存在着失学、失业、生活没有保障的困境。社会上对青年很不理解，认为青年是迷茫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责备比较多。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把这些账都算在青年身上。

作为团中央研究室主任，1980年4月，我为团中央起草了一个给党中央的报告，题目是《当前社会矛盾集中在青年身上》，请中央制定相关的政策方针，解决青年问题。同年7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文，《为一代青年成长广开出路》，提出培养一代青年的成

长，首先要解决青年的实际问题，为青年广开学路，广开才路，广开就业门路，广开文体之路，广开人生之路。当时还进行了人生意义的讨论。

面对香港的广东，是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大批青年想方设法偷渡香港，跑去了以后抓回来，抓回来以后又跑，让人想起《红色娘子军》里打不死的吴清华，这是很尴尬的。为什么从社会主义的大陆跑到资本主义的香港？因为生活差距非常大，你阻止不了他们。后来建立蛇口开发区，经济发展起来了，就安定了，人慢慢就跑回来了。开始时候偷渡罪名很大，叛国。农民就是为生活嘛，何必戴这么大的帽子。

第三件事情，是为《中国青年报》制定新时期的办报方向。在1979年11月13号，我在报社全体大会上做了一个长篇发言，《为造就一代忠诚社会主义的有真才实学的新人而努力》，把培养青年成为忠诚社会主义的有真才实学的新人，作为我们报社的神圣使命。我说，《中国青年报》停刊11年以后复刊了，我们的神圣职责，就是要求丰富报纸内容，改进报纸的版面。与青年更近一些，这也是借别的报刊的口号，人家做得好的，我把它接过来。同时，要求报社按照我在《人民日报》写的《为青年成长广开门路》，作为我们报纸的宣传提纲，关心青年的切身利益。有一件发扬青年政治民主积极性的事情，就是公开报导丰泽园青年厨师陈爱武批评商业部长王磊吃客饭，搞特权。这个报导当时震动很大，王磊听了以后就傻了：怎么可以公开批评一个部长呢？当时《人民日报》对这件事很支持，也登了这个报导。还有很重要的一条，中纪委也支持我们报导。接着我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大文章《开一代民主新风》，反映很强烈。官方有些人觉得，怎么可以这么做呢？而青年方面觉得非常好。有些青年原先看破红尘，认为什么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根本不相信党，不相信领导。这件事比多少红头文件都有效。因此我在《人民日报》上写的文章讲了这件事情的意义。这件事说明我们的青年的确是可爱的，可信赖的，这的确是一件大好事。不单是鼓舞了人们反对不正之风、实现四化的信心，意义更深远的是，它与人大代表行使民主监督相联系，正在开创一代民主新风，我们向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这个典型事例宣告了十分重要的两点：

第一，任何人民公仆，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对公仆行使监督、批评、任免的权利，是实现高度民主不可缺少的。第二，利用报纸监督公仆，好事表扬，错事批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建立真正民主生活不可缺少的渠道。我们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政治上应该有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的民主。要实行高度民主，还有很多工作要

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可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民主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党在前进，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陈爱武批评王磊之后一个星期，这篇文章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我们一方面关心青年切身利益，广开门路，另一方面保护青年一代的政治积极性。因此，《中国青年报》报纸发行量猛涨，从几十万份涨到三百万份，是历史最高的发行量。

第四件事是创立中国青少年研究所。我当团中央研究室主任的时候，感到研究室不能光给领导干部起草讲话稿和文件，首先应该调查研究青年情况，所以我建议，团中央和中国社科院联合成立一个青少年研究所。这个建议得到批准。1981年，就把研究室改成青少年研究所了，就在原来的研究室办公。同时，我把张黎群请回来当所长，他是《中国青年报》的老社长，也是反右时弄下去的。我因为还管《中国青年报》，兼副所长。当时青少研究所有20—30人。如谢韬的夫人卢玉，还有谢昌奎、唐若昕、李景先等。

创办青少所以后，金观涛找我，要出《走向未来丛书》，他找不到挂靠单位。我就写信给邓力群，说他们这些青年很好，我又拿了其中的一本给他看。他说，包遵信这个人不好，其他的人可以看看嘛。这样，《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挂在了青少年所，张黎群和我都兼任丛书顾问，支持金观涛他们出版了《走向未来丛书》。因为我们长期封闭，对国外新的知识、新的学术成就都不清楚，丛书传播新的知识，带来一种清新的空气，先后出了几十种，很受青年热爱，发行量很大，影响很好，大家都去买，把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柜枱和玻璃门都挤破了。金观涛当时也成了青年思想领袖。

（丁东，《炎黄春秋》原主编）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专访黄秋生：如果有机会走，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
2. 早报：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严重火灾，尖顶倒下，屋顶坍塌，钟楼安全
3. 中国农村有2000万单身汉，为了娶媳妇，他们都经历了什么？
4. 东京大学入学致辞：年轻人，等着你的，是一个无论如何努力也得不到回报的社会
5. 巴黎圣母院大火现场：“我希望这个孩子还能看看它最后的样子”
6. 2019金像奖：为什么黄秋生赢了周润发，而《无双》胜了《沦落人》？
7. 力求在40岁前退休，这些美国年轻人每月只花收入的四分之一
8. 早报：香港金像奖《无双》揽七奖成最大赢家，黄秋生封影帝却劝告不要学他
9. 早报：视觉中国网站因“黑洞”牵出国徽版权风波，深夜遭官媒批判并被约谈
10. 斯里兰卡连环恐袭逾200死，是“猛虎”复生还是“圣战士”开辟新战场？

编辑推荐

1. 最后一个月：台湾同婚将上路，跨国伴侣“一国三制”未解
2. 导演傅榆自述：如果已经没有伤，我可能就不会哭了
3. 杜卿：作为“记忆之场”的巴黎圣母院，透过脆弱寻回神圣价值
4. 斯里兰卡连环恐袭逾200死，是“猛虎”复生还是“圣战士”开辟新战场？
5. 一个甲子的句号：香港最后一本武侠杂志衰亡录
6. 劳工自媒体人危志立被捕，妻子郑楚然“假装”自由
7. “好”玩的游戏：伤残玩家与超人游戏
8. 美如仙境的火药库：拉达克探秘

9. 从实习到退休，台湾检疫犬的“狗生”，是什么样子？

10. 王晟：渡劫856年——巴黎圣母院的毁坏与重建

延伸阅读

胡耀邦的身后“待遇”：去禁忌，但仍未正常

纪念胡耀邦，如果尊重民意，最好是改变错误的历史定调，给“自由化”正名，给胡耀邦以公正评价。

从政治体制演变，看胡耀邦百年纪念

即便在执政党内部，围绕着胡耀邦这个政治符号的争议也从未绝迹，不同的人对于他的诸多政治主张存在着不同看法。随着2015年的到来，留给执政党思虑踌躇的时间越来越少。

让胡耀邦重回“名人堂”，使他彻底属于共产党

虽然许多人记住胡耀邦、感念胡耀邦是因为他那些在共产党内显得不太“主流”的东西，但习近平讲话中的胡耀邦，就是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标准像”。

改革派之死（上）：党内民主人士的尴尬与失落

在2012年，十八大中共换届之时，学者荣剑曾预言，八十年代的改革派，很可能随着习近平的上台而“退场”与“登场”了。但事实却是，仅3年时间，改革“派”就几乎彻底“退场”。

改革派之死（下）：消失的阵地与虚弱的渐进主义

渐进民主主义的主张所依赖的合力与倒逼，条件看起来已经完全丧失：党内民主“派”偃旗息鼓，党外力量完全被打压，整个社会彻底散沙化，原子化的个人将直接面对国家机器。